

(下) 素羅文論集

東方文庫第十四種

東方文庫目錄

- [1] 辛亥革命史
- [2] 帝制運動始末記
- [3] 壬戌政變記
- [4] 歐戰發生史
- [5] 大戰雜話
- [6] 戰後新興國研究(一)
- [7] 華盛頓會議
- [8] 俄國大革命記略
- [9] 勞農俄國之考察
- [10] 蒙古調查記
- [11] 西藏調查記
- [12] 世界之秘密結社
- [13] 世界風俗談
- [14] 日本民族性研究
- [15] 中國改造問題
- [16] 代議政治
- [17] 歐洲新憲法述評
- [18] 領事裁判權
- [19] 新村市
- [20] 貨幣制度
- [21] 社會政策
- [22] 合作制度
- [23] 農荒豫防策
- [24] 近代社會主義
- [25]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 [26] 社會主義神髓
- [27] 婦女運動(三冊)
- [28] 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 [29] 家庭與婚姻
- [30] 新聞事業
- [31] 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 [32] 中國社會文化
- [33] 哲學問題
- [34] 現代哲學一編
- [35]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 [36] 心理學論叢
- [37] 名學稽古
- [38] 近代哲學家
- [39] 柏格遜與歐根

- [40] 克魯泡特金
[43] 處世哲學
[46] 科學基礎
[49] 新曆法
[52] 笑與夢
[55] 石炭
[58] 科學雜俎(四冊)
[61]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4]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7] 美與人生
[70] 國際語運動
[73] 元也里可溫考
[76] 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9] 近代日本小說集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 [41] 甘地主義
[44] 羅素論文集(二冊)
[47] 宇宙與物質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6] 鐳鋆
[59] 近代文學概觀(三冊)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5] 但底與哥德
[68] 藝術談概
[71] 考古學零簡
[74] 東方創作集(二冊)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81] 枯葉雜記
- [45] 究元決疑論
[48] 相對性原理
[51] 迷信與科學
[54] 食物與衛生
[57] 飛行學要義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3] 近代戲劇家論
[66] 莫泊三傳
[69] 近代西洋繪畫(三冊)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5] 近代英美小說集

(下) 累 論 文 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社會制度論

一

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一九

俄國革命的理論及實際

四五

一、問題 二、鮑爾希維黨的理論 三、共產主義與蘇維埃憲法

四、李寧脫洛斯基和高爾基 五、國際形勢 六、都市與鄉村

社會制度論

朱 樸 譯

一

凡希望社會組織之根本改變有如余之熱切者，終必自問此社會制度彼目。一爲善而彼社會制度即目之爲惡者，果因何而使然耶？泰半之回答均不免爲個人之偏見。人每不以己之政治意見僅爲根據於此種理想的偏愛，但余則以爲大半之政治意見最後均來自盲愛某種眞有或空想之社會，無考察，無試驗，幾不自知焉。

欲求人民政治判斷力之能更明瞭，更合理，惟有提出各人意見中理想社會之

觀念，然後盡吾人之力，於其普遍中以求比較此種理想之方法。

余主應先將判斷社會之數種普通方法而余信其爲誤者，加以考察，然後始將余所認爲正當之方法提出。

二

大半人判斷社會最普通之方法，每僅憑遺傳的成見。凡在非急變之社會，均有前數代傳下之數種風俗與信仰，如有人反對之，則似爲異常可驚之事，此即關於宗教，家庭，財產，與其他一切方面之風俗也。希臘人則不然，彼等大半均在外經商或航海，經歷無數不同國家之風俗與信仰，因將他國及本國風俗之基礎，加以一番審慎之考察，此實希臘人之特長也。

此種遺傳心至今日漸衰，其故不僅因旅行與通商使然，實亦因實業主義之產生而引入社會制度之更變，有以致之。凡在實業發達之處，遺傳社會組織下之兩

大要素——宗教與家庭——均已失其在人類心裏之位置。其果乃使現代之遺傳勢力，較之昔時衰弱殊多。但雖云衰弱，仍與他種勢力之合併可相伯仲也。

譬之私產神聖 (Sacredness of private property) 之信仰。私產乃實業時代以前個人或家庭各自能造生產物時傳下之一種遺產，明甚。在工業制度之下，一人決不能造無論何物之全部，僅能造其至小之一部分。故如是而云一人能得其自己勞力之生產權，殊爲荒謬。譬一火車司機者，彼之職務爲駛總路之貨車至支路，運貨中之何部分可云代表彼之勞力所生產者乎？此問題完全不能解決。是以欲求社會之公平而云各人應得其自己之所生產，實不可能。馬克思以前之社會主義者常欲以此治資本主義之不公，但其議均近乎空想，因不合於大規模之實業制也。（惟多數人對於判斷社會制度之基礎，乃在其與私產之關係。）

三

又有一事影響人民對於社會制度——無論理想的或真正的——天性之判斷，即此種社會制度能否與某種人以一理想中適合之事業是也。無論何人均不能推想少年時代之拿破崙能熱心作世界和平夢者，或工業家被勃脫勞 (Samuel Butler) 之 “Erewhon”，書中機器均不法之說而即能動心者。美術家亦然，如某種社會圖畫須先取悅於市政廳之制，彼亦必將感無興趣。惟如是，美術家乃多為社會主義之敵矣。科學家反對在十七世紀時強迫其不准演講抵制宗教之制，俄羅斯之智識階級亦反對從馬克思之觀點以教其學校。彼常喜役人者，（此種包括世界上大半有智力之人民）必不喜無政府主義，因在無政府主義之下，人人可為其所欲為也。彼等所以反抗現時之執政者，非圖根本廢除，不過欲以己之勢力代之而已。若人人可為其所欲為，則執政者將無所事事矣。

自他方面言之，安樂之人民必惡急性的制度。練兵與嚴厲之教育方法，必為彼等所反對。在歐戰期內，彼等名此種制度為『普魯士主義』(Prussianism)。如其

知俄羅斯之詳情，必將名之「鮑爾希維主義」矣。余自認對此甚表同情，而自余見世界上最安樂之國之中國後，余之同情心且日益增。但今日尚非一安樂時代，此乃吾人期望將來及後代之生命較現在為尤深切之一時代也。

四

又有一事於無形中影響人民對於社會制度之判斷，即創造此種社會制度之事業能否與彼等合意是也。余恐革命黨常不能免此動機。革命黨中有仇惡占有階級較之親愛無產階級為尤烈者，更有一種人，其革命熱忱來自期望責罰中產階級之思想者。此種人在暴動之鼓吹者中可見之，因無暴動，則不能使其衝動滿足也。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亦有一相似之起源，與人戰爭或使人戰爭之思想為彼等所愉快，而愛國主義則尤自承為一專門產生戰爭之信條。雖然，余並非謂彼等之衝動乃來自其自知之信仰，余謂此種衝動乃來自其不自知之心理，且余尤

主張使此種衝動之動作顯露俾吾人可知其動作之如何然後復令他人知之因祕密與不自知之動力常與正理背道而馳無可討論且使客觀者難以判斷也。

五

社會學著作家與政治理想家之判斷社會組織也大抵有一普通之方法即視此種社會組織能否造成一理想中之快樂模型是也。社會為各個分子所組成無論其為善也惡也總必與分子之程度相合而後可。社會理想家每忘是理。彼等所理想之良好社會宛若本身自有其良好而與人民之良好無關係焉者。彼等所謂良好社會不過以其能與彼等一美術上或道德上之滿意而已。吾人知上帝創造世界之時亦必以世界為至美但此不過從較高方面為美學上之推測並非從世界上一班不幸者方面觀察也明甚。社會理想家亦然。彼等自以理想中所創造之世界為至美但不知設以己身親歷其境其痛苦將何如也。無論何人如能隨時按

中央之辦法，事事服從執政者之命。一若宇宙之服從上帝，此種世界當然純美。理想家意中常以執政者自居，宜其思想之如是矣。

後進國內工業主義之信仰，尤以屬於此種為多。坐香蕉樹下而食落果且自以為樂之懶惰民族，定為信仰工業主義者所難堪。某種社會主義組織亦不免有此種缺點，彼等重於創造一合於理想之社會，而輕於創造一合於人民同情心之社會。多數之軍國主義亦屬此種，彼等見地圖上本國之顏色多即欣然色喜，見本國之土地被外國領土之侵入而分裂即爽然若失。此種重理想輕事實之習慣之所以發生，蓋皆因重觀察者個人之幻覺，而輕彼親受國家政府痛苦人民之經驗，有以致之。此實不良學說之一種强有力之來源也。不知欲為社會理想家，必應有一至簡單而至重要之格言：其事維何？即國家者，乃人民居住之國家，而非若書中所讀之國家，可使吾人立在山巔有憑空之想像是已。

前述數種判斷社會之方法，吾人均信其為誤，茲將吾人能同意之數種判斷方

法論之

良好之社會有二要素曰現時之安寧，曰前進之力。此二要素不能常遇。有時現在無安寧之可言，而或能樹將來安寧之基礎。有時現在雖甚安寧，而將來或竟衰落。是以吾人必將此二要素分開，視吾人所認為應當存在者究為何種之社會。如社會動力學 (Science of Social Dynamics) 較發達而預言術 (Art of prophecy) 較不可靠者，則進步之要素當較現時之安寧為重要。但政治為非科學的，且社會之將來亦極難斷定，故某種現時之安寧較之某種無定之將來同為重要。雖某種無定之將來，如欲實現，必將較無論何物為重要，但以時間較長之故，不得不如是以計之。『一鳥在手足抵二鳥之在林』，此於吾人尚不敢決定林間有鳥與否時為尤確也。今進論何者造成社會現時安寧之問題。

判斷社會現時之安寧問題，應避去二種相反之謬說。吾人可名之曰貴族者之謬說及旁觀者之謬說。旁觀者之謬說已論之矣。貴族者之謬說，則本少數享受特殊權利者之生活狀況以判斷社會是也。古時埃及與巴比倫賦與國王、貴族及牧師以滿意之生活，但社會其餘之人大半均爲奴隸或傭僕，困苦萬狀。現代資本主義賦與實業家以快樂之生活，使有冒險及創造之特權，但與大多數之工人，則僅機器中之某處而已，無其他可選擇也。彼等因受生活之壓迫而不能脫其監禁，其所能者惟有聯合罷工停止機器之一法，但此種舉動實含有立受飢餓之危險焉。

擁護資本制度之人，常誇言資本制度給與企業者之自由，但此即貴族者謬說之一例也。新進國中如合衆國，以前其人民往往僅見資本主義最好之處，南美則至今尙然。但在稍舊之各國，其利源已發達且人口衆多者，則職業自由之理想僅爲少數人所夢及矣。合衆國早年時代之鐵路史，完全爲一種急進冒險之事業。但今日英國之鐵路則反是，其資本大半均握在閨女孤兒之掌，監督者均爲一班懶

情若死之貴族，其政策均襲自遺傳，絕不以冒險之計劃鼓勵新人物矣。此並不如皮毛觀察者之推測，因英美國民性之不同，實由古時地理與實業之各異而使然。但卽就資本制度最好之處及四十年前之美國情形而言，成功者亦僅善冒險而不畏懼之『少數者』。凡僅適合此種『少數者』之社會，除非犯貴族者之謬說，斷不能稱之爲滿意之社會也。

余恐社會主義者每犯此相同之謬說。彼等妄想在國家管理下開發實業，並自擬爲國家管理中執政者之一分子，但並非爲日常工人之一分子。在集權的官僚政治之國家社會主義之制度中，管理機器者除大宗財富外，實能兼現在實業家所有之各種利益而享受之。然財富之爲物，在有力者視之，不過事業成功中最小之利益，僅能表示一種能力與勢力，及爲博得大衆尊敬之工具而已。

但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固不僅大實業家能享受例外之生活已也，所有之執政者亦莫不如是。彼坐在政府辦公室內之人，其生活較之礦工優厚多多。乃多數

社會主義曾未聞有設法以救此種不平等者。實則資本主義所發達之實業機器，其不平等固較財富爲尤甚也。

此種不平等如不能補救，則社會主義之社會，其對於普通工人，決不能勝於現行之制度。但世之勞動政客與官僚主義者，每不能見及此點，因彼等皆自居爲新組織之領袖或執政者，而非普通之工人也。其實，彼等對於所欲創造之社會，其判断力已中貴族者謬說之毒矣。

或謂現社會上之罪惡宜逐一治之而非可一時除盡；或謂財富之不平等宜首先剷除，權力之不平等可待後再治，工作之不平等，則留於更後；或謂官僚的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爲最要之第一步，此固各有可言之理，而非余之所欲抗辯。余所抗辯者，則認此種社會本身爲良好之說也。

社會如不僅欲使一部分人享安寧，而欲使人人均享安寧者，則無論如何不能過分規律。執政者隨意用事，強以刑具刑法治人之社會，決非一良好之社會。人各

有不同之需要，故政制之最要者在適合大眾之需要而無害於他人為至要。劫掠的衝動固當遏制，此種遏制之不足，實為近世最大罪惡之一。但遏制創造的衝動，其為害亦相等。此即吾人所謂遏制制度之危險也。軍械機器或實業機器其處人也相同，惟少數管理者得享特殊之權利，對於普通之工人殊無寬容之餘地焉。

七

社會制度最重要之要素，其惟人民之信仰乎？近五世紀之歐洲，在吾人所謂之文明上有非常之進步，但信仰心之衰弱亦隨之而日增。余並非指宗教上之信仰。（雖亦為其中之一分）余所指者，乃社會秩序所根據之假說的信仰，已衰弱矣。政權之來源，均成疑慮；遺傳之法制，均失其管理之權。歐戰與俄國革命賜其餘之信仰——『最後之打擊』（Coup de grâce）。歐戰初，民治主義為一爭鬪之信條，人類幾若願為此而犧牲生命焉者。迨戰末，僅可憐之威爾遜總統獨宣傳其悲愴之福。

音，但世界則宛若無聞，依然如昔也。

欲保持社會秩序之存在，或須有某種不平等之必要，亦未可知。蓋在信仰時代，雖社會秩序使人類受痛苦，雖此種痛苦在後世人視之至為不幸，彼等始終信仰也。今則不然，彼信仰不平等之人乃自己受其幸福之人，即彼等亦自知其信仰為不純正，不過僅為一種自私心之結晶而已。但美國之大資本家則不能以此責之，除少數中非洲土人外，其質樸無華而不受新思潮之接觸，殆無有過於彼等者，故美國之商人至今仍極端的信仰資本制度。但他處之商人則僅希望資本制度之能與彼等同其壽命而已，否則除有充足之戰具，以死彼鼓吹好制度者之一法外，實無他可救也。

此種不親切之信仰，實不足以造出快樂。資本家自以為反對俄國為神聖之戰爭，但此種試驗在歐洲殊為失敗。除資本家外，無論何人均不復能對於舊制度有信仰也。

舊式制度之不復能造出快樂，不僅親受其苦者覺得如此，更不僅被征服國與貧民覺生命之無趣，即西歐之小康階級亦不願作久居之想。人生無目的，彼等乃投入狂妄尋樂之一途。但快樂愈增，痛苦乃愈甚。感覺上雖滿意，精神上仍飢餓。心靈上毫無安樂之感覺，惟有失望與空虛而已。

能醫治此種失望者僅一事，即信仰是也。人而不自覺其生命之重要，則將無快樂之可言。如其生活永為空虛之快樂所包圍，或痛苦至無盡期，則彼決不能了解人生之目的有價值，且永不能脫離失望。今日多數人對此失望均不自覺，惟其如是，故亦不能避免。譬如一鬼常在人之肩後，人僅能聞其細聲之言語，但不能使其面面相見也。如面見矣，則此種失望定可免去，但此僅能為一種新信仰及代替尋樂之法而免去。雖此言不免陳舊，但余終不信一勉強之生存，對於無天職思想之個人或社會為可能也。

僅一種天職為今人所能承認而無所疑慮者，即人對於社會之天職是也。以前

亦僅有上帝國家家庭等思想足以動人。但此時代今已過去在昔戰爭之時此種思想爲年老首領用以遣少年互相作無謂之殘殺。其時少年均信戰爭爲重要。但今則均已覺悟，自悔其錯。愈戰爭愈厭惡戰爭，其弊點彼得勝者已盡知之矣。

八

余今述良好社會所應有二種要素中之第二種。此種要素必爲進步者，必爲引入更好之一途者。根本之進步鮮有來自彼以現代社會制度爲適合爲安樂之人，譬如托辣斯之經理，吾人決不望其爲新紀元之開闢者也。新組織必來自創造的人民，如美術家，科學家，思想家，彼等大半可爲新組織之鑒定者。在商業主義勢力之下，人皆以生產方法之進步，機器之進步，以及交通之進步，爲最要之進步。此在昔確然，因從前勞工之生產不足以供大衆滿意之生活也。但今則不然，人類於物質上旣已有充足之貨物，則固可不必再供以過多之貨物矣。唯此競爭市場之商

業主義加之以富者之奢華乃使人僅視貨物之數量爲重要今吾人既已能使物質之來源足供大衆之足夠及安樂故今日最要者並不在求實業生產上之進步乃在求思想上之進步人每希望將從事於產生奢華與軍事上之精力用之於追求學問與修美生命之上將實業紀元前少數人享受之美術的優美追回爲今日之大衆所享用如此事而能實現則創造的人民如科學家美術家等必能享自由彼等必不爲國家官吏所管理且決不願作迎合現時偏見之工作矣人無自由則少年亦易於頹唐革新之初均爲多數人所不喜但無革新則社會不能有進步也凡一材能優異之人如彼等之工作爲創造者而非劫掠者則必當與之以自由此乃任何社會進步中最要之條件也。

執政者每有自以爲上帝萬能自以爲在各種新思想方面能判斷社會善惡之傾向此種傾向其爲危險尤在共產主義較初之時因執政者希望較昔有權也此種危險如承認創造的工作爲重要承認最好之創造的工作必不爲一時所讚美

即可解決美術家與科學家非必欲得其工作之報酬因彼等之作工盡出於自願也。但彼等必欲得其工作之自由必欲得其能使工作著名之自由譬一科學家應有自由印刷其著作之權固不必先經官吏之目而後可也。

今日之世界乃一充滿希望與快樂之世界也。吾人必求創造非僅專求遏制人類罪惡的衝動而已。罪惡的衝動固所必禁而尤應在過渡時代當此種衝動強盛之時禁之。但此僅為吾人工作中附屬之一部分並非其完全之目的。改進較好世界之最大目的即為創造衝動之自由如是則人類能自其中造一較樂之生活遠勝於今日野蠻爭鬭奪人所欲之時代矣。而吾人之所當努力者則使世人皆得享受物質方面之幸福使其意志自由用其暇時以從事於創造人生光榮之事業也。

庫 藏 万 束

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愈 譯

在討論本題之前，要先從自由的可能上着眼，把世界的情勢，講一個大略。自由的最後可能，現在比從前更大了，可是其中的危險，却也不小，眼前纔是最困難的時代呢。

戰爭給人類信仰加一番試驗，辨出那一種強，那一種弱。有許多因襲的思想，本來還可以存立幾時的，經過大戰，給人家看破兇相了，有許多向來當作上品的，有許多靠着不究根柢或激動初民的感情，纔能存立的東西，現在也都被掃盡了。戰

後的世界比平常更猛厲更艱難更兇暴了。老派和青年的區別也比平時更大了；因為老派的人使戰爭成爲理想化，竟告成功，於是和實際越離得遠；一般青年呢，現在却不比從前，倒有了實際的根據了。結果便弄得政治不像從前的好辦；雖然幾位領袖政治家還在那裏胡鬧，可是早已失却把握了；而且人民的意想，也多已道近實際了。

這次大戰的結果，不但自由黨失敗，便是自由主義也因此減色。威爾遜總統的失敗，更是自由主義失敗的一個證據。純粹的自由主義全靠着人與人的相互容忍，使一切事情不至於走到極端。宗教信仰的自由，民主主義，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貿易自由這些理想，意思是說人類各階級的齟齬，不是不能和解的。我是因戰爭結果從自由主義改變到社會主義的一人；這並不是因我不信從自由主義，不過我看除非經過社會經濟改造的過渡時代，自由主義實在沒有什麼大意思罷了。

大戰的結果使富豪政治(Plutocracy)與勞動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互

相對抗。社會主義到今日總算能够與資本主義分庭抗禮了。在俄國社會主義已完全獲勝，在別處也有掌握權力的可能。到底這兩種相反的主義主張的是什麼呢？

二

資本主義是因反抗封建制度而生的，所以他和幾種自由主義——自由、民主主義，平和——互相關聯。而且他也和增進生產互相關聯。到了現在，封建制度的遺跡，已經這次戰爭掃除盡淨了；在東歐作威作福的三大皇帝都已完結了。餘外只不過像彌爾頓詩裏所說，還有幾個『國王睜着眼惡狠狠的坐在那邊』（*The king sit still with a weful eye*）罷了。不過資本主義的勝利，多進一步，便和『未來』更不相容，而且離自由也更遠。我聽人家說，在美國自由神像的腳底下，現在却有一個監獄哩！

現在文明世界有一大部分正在恐怖狀態之下。我們想起過激派下邊的恐怖，常當不寒而慄，但在別地何嘗不是這樣，不過用意不同罷了。過激政府推翻後的匈牙利，現在又鬧着白恐怖了；其實世界別處和匈牙利比起來，還不是半斤八兩，不過面子上好看一點罷了。單講法國，自從喬雷暗殺案件判決後，個個人都說打死幾個社會黨，是不算犯法了。（譯者按喬雷爲法國社會黨首領，一九一四年因反對戰爭，被敵黨暗殺，現法庭判決，刺殺喬雷的兇手宣告無罪。）在美國呢，不論那個，要是大着膽子說一句贊成共產主義的話，不是監禁，便是要被放逐到外國去，甚至紐約州議會中合法選出的社會黨議員，竟不許在議會列席。在愛爾蘭，要是相信小民族權利，相信民族自決，或是同類的主義，那麼不問是誰，不待審問，早就捉到監獄裏去了。印度更不待說，那種同類的事實是不勝其數的。總之現在世界到處有兩種勢力明目張膽的在那裏廝打：一種是資本主義，有那被壓的民族主義做他的幫手；一種是資本主義，更有那戰勝國的民族主義，替他張聲勢。

因為世界有這種情勢，所以要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中尋自由是沒有人敢妄想的。但是民主主義是怎樣呢？民主主義是我們從事戰爭的目的之一。但現在我們聽得過激派說，我們向來信以爲真的民主主義，不過是資產階級所設的騙局罷了。在一方面資本主義者却又和我們說：用直接行動的方法，防止反動國會使不至侮弄多數意志，這種辦法是和民主主義相反的。究竟在資本社會內民主主義包含着什麼，且讓我們研究一下罷。

第一層現在所有的那些司法官和行政官都是和富人階級通同一氣的。國會議員甚至那內閣閣員因爲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得的入款的關係，自然不免和資產階級接近，這是我們所熟知的，資本家行事比勞動者更爲集中，迅速，祕密；而且照權力的心理看來，握權的人自然和資本的產業機械之指揮者更多同情，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民主國的憲法，人民選擇代表，只限於五年一次，而且只限於從幾個候選員中選出，這些候選員呢，實際上沒有一個是能真正代表民意。

的；因為選舉費用浩大，所以只有有錢的大團體，以及富有資產的大財主，在選舉中纔有成功的希望呢。

在投票選舉之前，民意也是由資本主義造成的。從學校起首，到報紙的鼓吹，資本主義都占優勢；學校教育教人在現社會裏隨俗浮沈，報紙除極少數的幾種外，都帶着資本主義的色彩。人在幼年時已被學校引壞了，等到長大又受了許多哄騙；所以除非是極有能耐極有獨立思想的人，在選舉時斷不會根據真理決定投票的。從前功利派學者極力提倡民主主義，以為一個人斷定是非利害，是極容易的事，投票選舉，一定能够顯出真是真非的。所以只要實行民主政治，那麼大多數人的利益，一定可以正當代表出來的。

這話固然好聽，要是他們仔細研究一下，就曉得不是了。平常人的意見，和住的房子一樣，是人家給他建造的，決不是從他自心發出的。他雖可以從幾種意見當中自由挑選，可是這幾種意見每受那外界勢力的嚴格限制。人當造出意見的時

候，先已有了限制了。所以民意往往會引到從事殺戮大多數人的戰爭或是餓死婦女兒童上頭去。許多年之後，這種製造民意的方法固然會失敗，其結果就是革命。可是從這種錯誤未達頂點以前，所受的困難已不小了。這樣說來，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中所謂多數人的統治，實際上就是支配創造民意方法的人——尤以學校及報紙為最——的統治。篤信這種制度或是反對直接行動，都是不合理的，因為現在所認為神聖的政治權力，乃是數年前選出的，眼前情形已大不相同了。過激派以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乃是一種騙局，引誘被騙者使其自己定自己的罪，這一層過激派是不錯的。

前次大戰發生的時候，資本主義說這亂子是德皇代表的封建制度鬧出來的。現在封建制度已完結了，資本主義可仍舊沒有創造真平和的能力。對共產主義的俄國還在戰爭，那不必說了；就是對於德奧也因為爭附著於資本主義的商業霸權，不得不施殘酷的待遇，這麼一來，世界那裏有穩固的平和呢。資本制度的繼

續和文化的繼續兩不相容，凡是有點思想的人，都知道的。資本制度若不消滅，大戰之後一定還有大戰，而且第二次大戰，應用科學更精，破壞力也一定更大，這個道理是和中午一樣明白的。這樣的大戰爭不消幾次，便可把歐洲人種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完全破毀了。

還有一層，資本主義到現在已不能成爲一種必要的生產方法了。在生產上那種很有根據而且很普遍的信條，已不像從前的能够替資本主義張目了。舊時的工作動機，現已失效，因爲現在那些蜜蜂已經明白做了蜜給養蜜的人喫是不值得的。現在全世界因戰爭的結果，不能不使生產非常增速，但是要生產能够增速，那麼除非另有一種新動機纔好，除非採用產業自治制才好。近來英國基爾特主義驟然興盛，也就是這緣故。我們現在正盼望曼却斯德建築業試驗的結果，那處自從用資本的方法對付房屋問題完全失敗後，才曉得唯有用基爾特方法，可以便房屋問題完全解決，才可以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均等滿意。多半因爲資本主

義在業務上的效能已經破滅，所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的進行，要比從前容易得多了。勞動者用經濟的正當方法要求什麼便可以得到什麼。除掉勞動者自己要求太和緩，此外沒有什麼礙着他們的路了。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從前使人家信服的幾種優點，現在都消失了。資本制度因為靠着托拉斯以及和國家聯合的方法，幾乎把人民的自由毀滅淨盡；因為能支配教育和報紙，所以使民主主義成爲騙局；因爲使各民族互相競逐，所以弄得世界永無平和的日子；又因爲使勞動者不滿足，所以資本的生產方法也失其效率。前三種弱點，是我們希望資本主義破滅的理由。第四種弱點，則又是我們可以達到希望的理由了。

三

資本主義不能得到自由，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能得到穩固的平和，而

且也不能得到世界所急需的生產增加，上面已講得很明白了；但這些弱點，決不能說是暫時的現象。不但不是暫時的現象，而且這些弱點一天一天的增大起來，資本制度越發比從前不滿人意了。但是社會主義從這幾點看來究竟怎樣呢？

從大戰爭產生出來的一切新事實中，最重要的便是現在有一大國居然已把社會主義實施起來了。從前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理論，尋常人都當作可望不可即的一種幻境。現在過激派的設施，爲功爲罪且不去管他，但至少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是適合於大國家的。過激派外有列強的反抗，內有敵黨的叛亂，在饑荒騷擾從來未有的時期掌握政權，又因封鎖着得不到外界的援助；可是這些都不相干，他們終於把仇敵打退，把舊俄羅斯帝國領土大半光復；國內飢餓到不堪，仍舊沒被革命黨推翻，而且以可驚的勇氣振興業務，恢復生產。祇有大革命時代的法蘭西人，纔可以和俄國過激派相比。而且就我個人所見，過激派對於世界前途所造就的，實在比法國耶戈本黨人所造就的重要得多；因爲過激派活動的規模闊大。

得多，而且他們的理想也新奇得多了。我相信全世界社會黨都應該輔助過激派和他們協力進行。我又以為基爾特主義者對於過激派的組織方法應該十分注意纔好，並非因為過激派有權有勢，不過過激派組織勞農會不以地理為基礎，却以職業為基礎，這種辦法是很值得注意的。

四

但我不是說和俄國情形截然不同的我國，也應該瞎着眼跟了俄國走。我固然和其他信奉基爾特主義的人承認職業組織的重要，不過我同時相信依照區域選出的巴力門，也有他的用處；所以照我國的情形，我不主張因為巴力門與蘇維埃形式相背應該把他完全廢除。而且我極相信在我們英國若要實現社會主義，不用武力革命一定辦得到的。我不主張跟着過激派依樣葫蘆。在俄國或者只有用這條法子可以成功，但決不能說在我國也只有這條法子最好。我們的情形全

然是特別的；要是社會主義實施起來，也許歐洲大陸上倒有好幾國和俄國情形相似，很可採用和俄國相似的方法。而且現在過激派攻破仇敵大得勝利，歐洲大陸社會主義的傳布，也許是近在眼前了。

過激主義在目前排斥多數人所信的兩種主義，就是民主主義和自由。我們爲了這一點便看輕過激主義麼？我想是不然的。

五

所謂勞動專斷(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本是一種過渡的狀態。一種戰時的政策，因爲舊式資產階級的餘孽，還在那裏掀動反革命，所以不能不用這種方法來鎮壓。據李寧——馬克斯的弟子——的說法，國家這東西實質上本來就是社會中一階級專權的意思。待共產主義把階級的差別廢除了，國家也自然而然的消滅了。等到社會中除勞動者外已沒有別種階級了，那麼所謂勞動

專斷當然不成意義，而所謂國家——照李寧所說的國家——亦必不能存在了。勞動專斷將使少數人在一時期內獨攬政權，我們根據這種理由去反對勞動專斷是對的嗎？我們根據這種理由，反對我國政治上的直接行動也是對的嗎？李寧主張勞動專斷，有極正大的理由：他說反對共產主義是一時的現象，一旦共產制度建立以後，便會得全世界的擁護的。這種理論對不對，只有事實可以證明。假如事實上像俄國那樣，反對共產政府的大半是無知無識的；假如新政府確能使人民擁護他，那麼可見過渡期的強力專斷並沒有錯呢。民主主義呀，自由呀，那種論據，只有在平常時候用得着；在大變動時期和世界革命期時，本來是不能拘泥的。在現在這種可怕的時勢，人祇有堅守自己的信仰；至於那信仰對不對，要看事實的結局如何，才能够證明。我想若把我們在平時所用的那種論據那種主義來觀察俄國的情形，簡直是腐儒的見解。俄國只有堅強的意志可以挽救，但是沒用一種專斷形式，單是堅強的意志，能不能挽救俄國恐怕是一個疑問罷。

我並不設想，這種辦法可以適用於我國，雖然現在社會主義的完全建立已經很近了。英國自從一六八八年以來有一種喜歡溫和的脾氣，過激派那種方法不見得能够合尋常人民的心理。而且英國的反動派也不像俄國那般的愚昧，所以那種強力的方法，是不對的。英國工黨常因為太溫和被人家詬病，但反對黨也是很溫和的，前次鐵路罷工便是個很好的例。馬克斯是階級戰爭學理的代表者，他也說社會主義在英國可用平和方法做到的。馬克斯的話在別處很有應驗，我們盼望他對於英國也是真的先知罷。

但在大陸各國呢，却不能有那些希望。俄國就是一個例證了。俄國共產政府被資本主義各強國共同迫壓，居然抵擋得住，我因此相信——雖然預測未來是最靠不住的事情——十年之內，德法意諸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多半可以拿得穩的。要在這幾國內實施社會主義也許免不了要發生與俄國相同的戰爭和恐怖。而且我更不信社會主義假如勝利，勝利的範圍一定只限於多數信仰社會主義的

國家，別的國家也要被強迫做成的。單舉波蘭爲例，波蘭說不定還要落在俄國手裏和俄皇那時一般。波蘭人民爲了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定要反抗社會主義，那時俄國對於波蘭要求獨立和屠戮猶太人，勢必用強力壓平；而且一定更要嚴格取締教育，使後起青年深印着馬克斯主義才止。巴爾幹諸國也會發生相同的困難。所以至少在三十年內國際社會主義政府在許多地方一定還要成爲武裝政府，而且嚴格管理報紙和學校呢。

過激派現在的用意雖沒什麼帝國主義的野心，可是說他到了將來也不至有這種行徑，那是不對的。過激派對世界的眼光，和古代回教徒一般，同時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他們服從馬克斯經濟發展所不免的方式，所以自信他們的最後勝利是可以拿穩的。他們現在看作頂重要的便是武器，應該入階級自覺的勞動者的手中。他們只要得了武器，便可以從事宣傳了，便不難把一般給資本家花言巧語——像宗教和愛國主義等——哄騙着的勞動者都喚過來加入他們那邊了。

所以他們要是統治歐洲到了幾十年後也許社會主義當中另有一派起來和他們反對，至於已死的舊勢力決不會復活起來反對他們的。

我們假定過激派的成功繼續下去，的確要變成上述的情形，那麼我們還是應該去促進這種情形呢，還是因為要有流血和恐怖而且人類文化至少暫時總要受點損失，便畏縮着不去催促呢？

照我個人的意見，以爲世界的進步，全要靠社會主義的勝利，這種勝利便是出了重價去買也是值得的。而且國際社會主義一日未唱凱歌，世界便一日不得平和，把國際社會主義的勢力增起來，把和他反對的勢力削下去，那才是世界和平的捷徑呢。我相信「出征的人多一個，平和也快一些。」我所說的社會主義卻不是水乳制度（Milk and water system）乃是李寧所企圖的徹底的根本的改造計畫，要是尋求平和非此種主義勝利不可，那麼我們就在資本制度強迫我們所起的爭鬪當中受點苦處，有什麼不上算呢？

但在這結論上頭，還有幾層却也應該注意的。

最重要的便是社會主義不該棄去國際主義（無國界主義）。我們想像世界幾個大國實行社會主義之後，仍以國家為基礎，大家為了佔領原料互相爭競，這也許是可能的；譬如高加索的油礦便可成為各國的競爭地。因為社會主義若只是國家的，那麼在本質上本沒有和排外主義（Chauvinism）不容的地方。過激派為宣傳社會主義而戰爭，雖屬正當，但這種戰爭，在社會主義國和資本主義國之間，很容易變成國家化。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廢除掠奪，掠奪廢除纔不至再生戰爭；但國家的掠奪要是仍舊繼續，那麼社會的掠奪怎能廢除呢？所以要社會主義確立，須得把原料歸國際的政府分配才好。社會主義有沒有力量能把民族利害民族感情壓平使原料歸國際分配，這却是個疑問；但這一層如能做到，那麼防止戰爭一定不費什麼力了。

除原料之外，還有一個問題，足以使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發生競爭，那便是移民

權利問題了，好多年之內，在澳洲和南北美這問題關係恐怕很重要罷。

除在美國外，現在還有一種強大的民衆勢力，和社會主義反對，那便是民族主義的勢力了。民族主義的意義，就是不管人家什麼只圖己國利益的一種決心，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一種迷信，也就是各民族間固結不解的那種仇怨。在和約造成的各新國中，這種民族主義大概絕對佔有勢力。有許多國家情願忍着飢餓去屠殺鄰人，却不願意和他們所仇視的鄰國，好好兒的過太平日子。這種心理，一半是出於本能，一半却是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所以除非用強力遏止爭鬭，促進貿易自由，改革教育，決不能把這種心理，立刻鏟除。國際聯盟是一種戰爭仇怨的產物，教他去遏止民族爭執，是萬萬不勝任的。在現在世界各種勢力當中，只有國際社會主義，纔真能把人民好戰的心理完全改變。我不敢說國際社會主義能够立刻把人民心理改變，但我敢說國際社會主義握權之後，幾十年內，一定做得到的；因為國際社會主義的目的本在排斥本能，因襲和利己心，而另建一種普遍

的理想，使多數民衆可以因此得到物質幸福呢。

社會主義實行以後會發生何種困難，引起何項問題，且不必擔憂，我總以爲要是西方文化不至於消滅，那麼世界的進步是非經過這一個階段不可的。而且社會主義能够造成多少功德，却要看那創造社會主義者的一般的希望如何。要是大家都知道，經濟掠奪的罪惡，大家都希望把這種罪惡消滅，都希望另建一個新世界，那時一定有一種新勢力生出來，把盤據人心的民族主義盡行逐去。現在歐亞二洲，只有那國家主義還幫同資本主義助紂爲虐；一旦國家主義除去，世界多數文明人類自然會得採用國際社會主義了；這種新制度一經採用以後，因爲有許多的便利，而且在這種制度下面不會生出不滿意的階級，所以地位一定很可穩固，不是輕易推得翻的。

六

自由、民治、平和、生產效率的增加，以及經濟的公平，只有從國際社會主義纔可以做到；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法子了。但社會主義雖然可以做到這些，將來究竟做得到否，却並不一定的。將來做得到這些或做不到這些，却要看那先驅者的態度如何，奮鬥的勇氣如何，勝利者的性情如何了。

我想我國在這過渡時期內——經過了基爾特主義——應該有一定的供獻。我想我們在這鬪爭中，比較他國，更容易維持個人自由的理想，沒有那種理想便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造成之後，也是呆板的，無進步的，無生氣的。自由和戰爭勢不兩立，可是擴張自由的範圍，也是社會黨所公認的目的之一。社會黨的目的：（一）在工作中採用工業自治制以謀羣體的自由；（二）在工作外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以謀個人的自由。社會主義的形式有多種，謀達到社會主義的策略也有多種；但是那一種是有價值的，只看他能不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就好了。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同，只不過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這是毫無疑義的。

社會主義之後，繼承的是什麼，我們現在還無從推測，或者是無治主義也未可知。要是社會主義和遷到君士坦丁以後的教會一樣，把自己當作正統，束縛人類的心靈，阻止思想的發展，到千餘年之久，那麼對於世界未來的進步阻礙是很大了。若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用武力經過長久的戰爭得來的，那麼這種結局並不是不會有的。單從這一層想——不要說別的——已可見社會主義的勝利，應該用平和方法博取了。

凡是人類生活上的強有力的主義，大概總要經過三個階段的。一種主義初起的時候，總是很可親愛，很合於人道，很能使人信服，所以不必用武力也有人肯信從的。到了第二階段便不然，那時主義自身有點勢力了，反對的也兇惡起來了，要是不用武力便不能立足，所以主義成爲戰爭的標幟，便不像先前的和善可愛了。等到第三階段，主義完全勝利，掌握大權，便顯出壓制暴虐的手段來。基督教遷到君士坦丁之前是在於第一階段，到了十字軍興起便入第二階段；等到後來屠戮

異教徒已是第三階段了。

資本主義也經過相同的階段。在斯密亞丹、谷伯頓(Cobden)、伯賴衣(Bright)的時代，資本主義是一種可愛的東西。推翻封建制度的時候到了戰爭的階段。等到掠奪在下階級，施行反社會主義的恐怖政策時，已入於最後的專制階段了。民族主義的發展，雖在各國有強弱大小之分，可是也經過同一的階段。馬志尼代表可愛的階段，俾士麥代表戰爭的階段，近代帝國主義的膨脹，便已入專制的階段了。

社會主義自從李寧得勢以後，已從可愛的階段走到戰爭的階段。社會主義因此已失却許多娛悅人心的可愛的面目了。有許多人覺得現存的世界，壞得不像樣，很熱切的希望另有一個較善的世界，可是在排斥世界罪惡的戰鬪中，又畏縮着不敢出頭。自然有人要說他們不徹底了，但我和這些人却很表同情。我看不論那種主義，在鬪爭的時候，免不了逐漸退化的；往往一個黨派用強力得勝之後，反

將所以要希望得勝的那種精神，大半失去。而且暴力的鬭爭往往使社會退化；久的廣大的鬭爭，不用說是更壞了。

社會主義有各種的形式，將來各國社會主義勝利之後，各採各的形式，那也許是可能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目的便是自由；這個目的比秩序和增加生產能率這兩個目的更為重要。國家基爾特主義者比集產主義者把自由更看得着重。基爾特制度設巴力門和基爾特議會使權力互相平衡，目的是在於求得政治自由。基爾特主義者所主張的工業自治制，恰和國家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官辦制度相反，目的在於求得各種產業工人的自由；國家的產業和地方的產業都是這樣辦。基爾特的移轉制度（System of devolution）——不單是以地理為本位，而且是以職業為本位——對於創造自由意志，使個人有創意權，使工人得從事有益的試驗的機會，這幾點更是極重要的。

工作中的自治制是人類所爭的一切自由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因為和人關係

最切的便是工作，而且要引起政治自覺，最好是用工作自治制。工作的自由本是工團主義的主要目的，也可說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我相信用國家基爾特制度，一定比用別種生產的經濟制度，更容易得到這種自由。用了工作自治制，使勞動者可以獨立，可以自己管理，那麼一定能把平常勞動者對於工作的觀念完全改變，而且一定能够激發生產能力，比舊時資本家單用恐怖政策鞭策勞動者，自然要好得多呢。除工作中的自由之外，自然也應該有工作外的自由，就是休息時的自由。要求得這種自由，須把勞動時間減少，採用效率較大的工作方法纔好。在現在採用效率較大的工作方法，不過使資本家得好處罷了。但在新制度下，得好處的仍舊是勞動者，所以改革之後，生產能率一定比現在進步得多。只看過激政府採用泰勞(Taylor)的科學管理法，就可想見了。

但此外還有一種自由，這種自由雖只和少數人有關，在人類進步上却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便是人在社會組織中應該有拒絕加入任何職業的自由。譬如

一個人有的喜歡傳播新宗教，有的志在發明新科學，有的情願創造新藝術，這些人當然沒有相當的行會（基爾特）可入，那麼社會要把他們當作遊民或是流氓了。不論經濟制度改變到怎樣，凡是重大的革新，總是和社會意志反對的。爲這等想法，總得使自願耐苦的人不至於受新制度束縛才好。例外的待遇也許是有害的應該戒忌的；但對於志在犧牲百折不回的人總不該使他受阻。要是希望社會進步，特殊和例外待遇是應該絕對注重的。在我們英國要是採用社會主義，總得逐步的不板定的採用才好，這樣比過激派採用板定的式樣使特殊和例外的分子都忍受苦痛總要好得多了。我們希望大陸社會主義做到之後，也能够想法補救這種板定的式樣的缺點。關於這一層，我更相信我們對於最後的結局能够有重要的供獻。

資本主義在今日已不容於世界，人類文化的遺產，已不是資本制度所能保全了。假如國際社會主義能够不經長期的慘酷的戰鬪便告成功，那一定能保全文

化的反對社會主義進行的人自己要負重大的責任舊制度的保存是做不到的；反對派費了許多氣力，祇不過使新制度失却許多價值罷了。我們贊成社會主義的人應該記着：我們打敗敵人却沒有像打敗自己的容易；要是我們努力創造的新社會中，人類創造精神的自由，平常男女的生活自由，比舊社會不會更多，那麼就好算我們自己打敗自己了。雖然我以為在我國用不着武力革命，但我却不相信武力是全然不必用的。武力是達最後目的的一種工具，所以應該和宣傳相附而行。武力應該用了使人心歸附，不應該用了使人民厭棄。而且無論何時無論何事都應該弄清楚：用武力乃是臨時的手段，最後的目標不在武力却在於造成不用武力的社會，只有從大希望心的鼓舞，從我們所求的較善的世界的實現，纔可使我們的目的不在鬭爭中退化，纔可求得勝利，不單是吾黨的勝利，而且也是各種主義的勝利，便是自由主義，經濟的公平主義，國際協進主義等，這種主義是世界所需要的，只有用社會主義纔能够做到的。

俄國革命的理論及實際

愈之譯

一 問題

想給鮑爾希維黨加一個不失爲公允的批評，就有許多的困難。第一層，我們一想到鮑爾希維黨，便起神祕奇異的感想；不論是贊成他們的或是反對他們的，都有些過火；說得好是天上的神仙，說得壞是地下的魔鬼，却沒有把鮑爾希維黨當作平常人類看的。而且研究他們的制度時，要分析出那一種是特殊的鮑爾希維黨，也不是容易的事。從鮑維希維黨的許多方法看來，也只不過是俄國式和同國的別黨方法也沒有什麼區別。便是拿俄國人和英國人比較，也不能說一定有顯

然的區別照我看來拿英國的斯密賽 (Smailie 工黨急進派領袖) 邱吉爾 (保守黨領袖) 和俄國李寧柯爾恰克相比，也不過是二五一十。我們評判鮑爾希維黨，須看他們和俄國人民關係如何，要是換了別黨組織政府又是如何。至於拿他們的理論和西歐比較，只有講到鮑爾希維黨的國際宣傳時，才是必要的呢。

觀測俄國情形時還有一樁事情應該記着。俄國是大戰中戰敗國之一，所以應該和德奧國內的情形比較才對，不應該和英國美國去比。我自己對於這兩種準備都不大完全。我並沒研究過革命以前的俄羅斯，也並沒見過戰後德奧的情形。我希望只有問題的實感，才能够使我免於錯誤，這種錯誤好像有許多游俄的英人都免不了的。

我進俄國之前，讀了許多關於鮑爾希維主義的書——贊美的和咒罵的都讀過；可是我後來看到勞農政府的理論和實際，和我所預期的却全然不對。現在要使讀者知道我所受印象的輕重，所以先把路上大概情形說一說。

我於五月十一日入勞農俄國，六月十六日出境。俄政府限定一個條件：只准我們隨着英國工黨代表同游；這個條件我自然樂於聽從，而且工黨代表也應許我的。我們從邊境到彼得格拉，以及以後的路上，都乘坐很講究的專車，車上張着關於各國社會革命和勞動者的格言。我們到處都有軍隊招呼，軍樂隊高奏國際樂歌，市民脫帽站立，兵士行致敬禮。各地方的領袖都出來演說祝賀，由陪伴我們的著名共產黨員一一答謝。車門前面有穿華服的白許吉（Bashkir）馬隊護衛着。總之一切情形都使我們覺得和威爾士親王（英太子）一樣的闊綽。此外更有各種的排場——宴會，大會，閱兵——特地為我們佈置起來。

他們設想以為我們到俄國來，是為考驗俄國共產主義和英國勞動者是否一致的，所以他們拚命的向我們宣傳鮑爾希維主義。至於我們呢，正因為在帝政的空氣內，無從知道俄國的情形和俄國的政治方法，所以想來看個明白。因此我們和他們互相暗鬪，有的時候和捉迷藏一般。他們告我宴會何等的華麗，游行何等

的隆盛我們却竭力陳說，還是在街上安安靜靜的走來得更好。我不是工黨代表團的團員，所以不至於像我的同伴那樣的拘束；凡是宣傳性質的大會——這種大會的演說辭大概都可以預想得到的——我可以不去。因此我便可用中立的翻譯者——大多是英人或美人——做翻譯，和街道上草地上偶然相遇的人談談天，藉此明白一般無政治關係的平常男女對於新制度的態度究竟是怎樣。起初我們在彼得格勒住了五天，以後又在莫斯科住了十一天。在這時候我們每天和政府裏的要人相應接，因此得以熟知政府中人的意見，沒有什麼費力。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兩地，盡我的力，也見了許多智識界中人。政府應許我們有接見反對黨政客的完全自由，我們也儘量的行使這種自由。我們見過門希維黨 (Me. nsheviki) 各派的社會革命黨，無治黨，接見的時候，沒有過激派在旁，而且他們起先雖有點畏懼，後來却講談得很自由。我和李寧作了一小時的密談，我也遇到脫洛斯基，不過在人羣中遇見罷了；我和喀美納夫在鄉間同宿過一夜，還有許多

在俄國外不甚聞名，却在政府裏占重要位置的人，我也見過不少。

我們住在莫斯科臨了的時候，都想到鄉下去，看看農民的情景，因為俄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呢。政府對於我們這種願望，表示很大的厚意；於是替我們代定行程：沿窩瓦河而下，從尼內諾烏斯（Nini-Novgorod）到薩拉多夫（Saratov），經過的大小地方，任便停留，而且可以和住民自由講話。在這一段行程中，我着實得了許多教訓。我所目見的那些農民，鄉村教師，猶太小販以及各種人民的生活和外觀，比我所想像的差得多了。不幸我友亞倫（Clifford Allen）害了病，我便費了許多時候陪伴他。可是因此也得了個好結果，因為他病重不能離船，我却能坐了船到阿斯德拉根（Astrakhan）；這麼一來不但使我多得了些鄉村的智識，而且又結識了一位人物，便是代理運輸總長施佛德洛夫（Sverdlov）。其時他在船上辦理從巴庫運油到窩瓦河的事情，他也是我在俄國所遇最能幹最和善的一人。

有幾件歷史的事實應該記在心上。那克倫斯基政府，據我們所知，本來是想求自由的，後來竟弄成擾亂，弄得全國停止工作；在這時候要使國家免於劇烈的破壞，自然只有用嚴法才好。而且那時克倫斯基既不能戰又不能和。他不能維持紀律所以打不成仗，他全依賴着協約國，所以也講不成和。據李寧向我說，鮑爾希維黨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七月還沒有收服人心，但後來的幾個月中突然為人民擁護，這是因為那時好像只有他們能够而且願意把土地分給農民，把平和送給國家的緣故。當十月革命之後，鮑爾希維黨起初和左翼社會革命黨聯合，可是後來因為白萊斯里吐夫斯克議和問題，又和他們分裂了。左翼社會黨本來抱定一種主義，主張俄國不應該和社會革命未曾成功的國家講和；他們現在還抱這種主義，所以反對現政府想和協約國講和的願望。英國一般的議論，把俄國人分作親德和親協約的兩派，可謂荒謬極了。英國人因為俄國簽定白萊斯里吐夫斯克條約，便說鮑爾希維黨是親德派，那麼德國也簽定了凡爾賽條約，難道說是親協約

不成俄國人已經被打破了只有那些不明事實的人還以爲繼續戰爭是可能的那些人呢，現在仍舊是同一的精神，正在那裏反對和協約國講和哩。

鮑爾希維黨對於右翼和左翼社會革命黨，不得不用嚴法來禁壓，因爲右翼曾和台尼金聯絡，左翼又曾把米爾巴黑(Mirbach)殺却。從那時起，反對派的政黨，除門西維黨外，都認爲非法機關。便是那門西維黨，當他們的中央委員加入台尼金內閣時——這是據鮑爾希維黨說的——在短時期內也認爲非法。但現在他們已經被赦了，而且現在莫斯科勞農會中也有幾個門希維的黨員。

鮑爾希維黨和德國講和講畢了，土地也給了農民了，於是他們便失了人心，因爲在俄國和在別地一樣，政黨收攏人心，全仗着對於將來的保證，不是仗着過去的功績的。鮑爾希維黨究竟不能造成真平和這是顯然的事，他們不能不把俄國重新化成武裝，這也是顯然的。他們爲城市尋求食物的那種粗率的方法，又使農民懷恨；那時除了紙張外，沒有交換農產物的東西，他們用這種方法，本來也是不

不得已的。

人心的離貳迫他們不得不使用高壓及集權的手段；生產的急切需要又使他們不得不採嚴峻的工業強制法。這幾種情形便造成和愛好自由的人不合的一種空氣。但我們須要記着：自由的減削起源於戰爭，而封鎖更是主要的原因。現在除非議和，除非製造品的充分供給，造成現在那種罪惡的壓迫是不會減輕的。

二 鮑爾希維黨的理論

當我入勞農俄羅斯國境，在荒蕪的低地，松林，鐵絲網中間，經過邊界上做標幟的紅旗之後，所發見的第一事便是：鮑爾希維黨實行派所持理論，却和英國先進社會主義者所傳說的鮑爾希維黨的理論完全不同。此間贊助俄羅斯的人都以為勞動專斷不過是一種新式的代議政治，只有工人與婦女有投票權，選舉區域是一部分以職業為單位，不是以地理為單位的，他們以為『勞動』便是『勞動』，

「專斷」却不是「專斷」但實際上恰巧相反俄國共產黨講到「專斷」這字倒和本義相合講到「勞動」這字却不是一定指勞動了。他的意思是指「階級自覺」的勞動者就是共產黨。他把不是勞動者而有正確思想的人（像李寧姬采林之類）歸入「勞動」之內；確是賺工資的人而沒有正確思想的，却把他屏除，稱之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忠實信仰黨綱的共產黨員深信私有財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這種信仰非常之堅定，甚至為建設及扶持共產國家計，採用極殘忍的方法，也沒有什麼顧忌的。共產黨不肯寬縱別人，也不肯寬縱自己。他每日作十六小時的工作，在星期六的半日休假內也仍舊工作。不論那樣煩難危險的工作——像消除柯爾恰克或台尼金留下的有傳染病的死屍之類——都願意去做。他雖有權位，雖有支配食糧的權力，可是自奉却非常刻苦。他並不想求個人的權利，目的只在於創造一個新社會的秩序罷了。但是使他刻苦的動機，同時也使他變為殘酷。馬克斯說過共產制度是注定要發生的了；這種信條和俄國人的東方性質配合，便造成

和古時穆罕默德教徒相似的一種心境。對於反對黨毫不憐憫，而且不恤用俄皇所用的警察方法去懲治他們（俄皇所用的警察現在却有許多仍在供職）。但是這個都不相干，他們以為一切罪惡都由於私有財產，鮑爾希維政府當打破私有財產時雖也不免於罪惡，可是新制度成功以後，那些罪惡自然不消滅也消滅了。

這種見解是一種狂熱信仰所常有的結果。英國人從一六八八年來有一種生活所依據的信仰便是仁慈和忍耐抵得過世界一切的信仰；這種信仰我們委實沒有適用到別人種或被治的民族裏去，現在見了俄國的情形，又得了個佐證了。一個極新的社會，自然可以找出歷史的事實來比較。現在俄政府從壞的方面看來，和法國統監時代（Directoire）差不多，從好的方面看來，却又和克林威爾的統治相似。忠實的共產黨（共產黨的老黨員，經過多年的虐殺，可以證明他們的忠實。）從他們的嚴格的政治道德看來，和清教徒兵士不能說不像。克林威爾

的對付議會和李寧的對付憲法會議也不能說不像這兩派都是從民主主義和宗教信仰的結合而出發的，可是後來却不得不犧牲民主主義，用武力專斷的手段貫徹宗教的信仰了。這兩派都強迫他們的國家在道德和努力的較高的平面上生活，這種却不是人民所能容忍的。現代俄國的生活，和清教徒時期的英國相同，有許多地方都和本能反抗過激派要是最後終於失敗，一定和清教徒失敗的原因相同的；那原因便是人民覺得快樂和安閑比別的東西併合起來都要好，到了這一點便要歸於失敗了。

但用柏拉圖的理想國來比，比用別種歷史事實來比，要更切合得多了。共產黨可說是理想國的保護者（*Gardians*），俄國的軍人便是理想國裏的軍人；俄國對於改革家庭生活的企圖，也多少和柏拉圖所說的相同。我敢斷定現在全世界領導柏拉圖學說的人都是反對鮑爾希維主義的，而且鮑爾希維黨也一定把柏拉圖認為老朽的資產黨；可是拿柏拉圖的理想國和鮑爾希維黨所企圖創造的國

家來比較，却再適合沒有的了。

鮑爾希維主義在裏面含着少數獨裁主義(Auto-cratic)在外面却是武力主義。凡少數政治少壯有力時的好處和壞處，共產黨都有了。他們勇敢，堅毅，能够號令，又常常勇於服務；但在別一方面他們是專斷的，是不能處處為平民着想的；如他們叫僕役做過度的工作，又每以過度速率亂駛摩托車，使街上人民的生命發生危險。他們實際上獨攬大權，因之獲得無數的便利。他們當中大部分的人雖然並不見得奢華，但是食物比別的人民總好些。只有幾個政治要人可以坐摩托車，可以裝電話。至於鐵路旅行，在勞農會所開店裏買物，（向此種店裏買物，價錢祇照市價五分之一）到戲院看戲等事的許可，握政權的人的朋友，比平常人自然容易辦得到。總之從許多方面看來，共產黨員的生活，總比其餘人民快活些。而且他們也不至於像平常人處處要受警察和特別委員的監視。

共產黨對於國際事務的理論，非常簡單。馬克斯所預言推翻全世界資本制度

的革命，雖然在理論上應該從美國開始，但現在却已在俄國起來了。共產黨對於革命還沒有爆發的國家的唯一的義務，便是使革命從速發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妥協，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雙方面都不能得到誠意的平和的。不管那一國非經流血革命，決不會有真正的好處；英國工黨以為平和的進化是可能的，共產黨却說是錯了。李寧向我說：他希望勞動政府得在英國出現，而且希望他的黨人幫着做去，但不過想要使英國勞動者確實明白議會制度的無用罷了。除非使勞動者有了武器，而且把資產階級解除武裝，是不會有真的好事情的。要是主張別種方法，不是社會的蟊賊，便是受人哄騙的獸子了。

我把上述的理論，細細估量一下，當然承認其攻擊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一點；可是我對於這種理論，却根本反對。第三國際是為促進階級戰爭及使各國革命從速發生而設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資本主義不至於像鮑爾希維黨所說那樣的不好，乃是說從戰爭得來的社會主義不見得一定十分好。戰爭的罪惡，——

內戰的罪惡爲尤甚——是一定的而且極大的，從戰勝所得的利益却未必拿得穩。在拼命的戰爭中，文化的遺產不免於損失，而且人類間的仇怨，猜忌，兇殘，未免要變成慣常。要求戰爭勝利自然不得不把權力集中，權力集中又不免和資本主義的富力集中一樣，造成同一的罪惡。一國的革命，雖不免使文化受其損傷，却還有其他不革命的國家，可以設法修復；但在全世界大革命中，可沒有法子了，文化的損傷，恐怕要等千百年之後纔會得復原呢。不過我雖不贊成世界革命，却不能不斷定各大資本國政府之所作爲，都是要促成世界革命的。且不必說別國，就是我國，儘管濫用權勢，去和德國、俄國、印度作對，就很容易推翻的；到了那時，反對鮑爾希維黨的人所最恐怖的事情，恐怕就要實現罷。

真正的共產黨都是抱着徹底國際主義的。單舉李寧來說，就我所見，他對於俄國的利益，並沒比世界的利益看得更重。俄國現在是世界革命的主人翁，所以共產黨對於俄國很爲寶愛；但要是俄國的生存和世界革命二者不可得兼，那麼李

寧也情願把俄國犧牲的。這是他們的正當態度；共產黨中許多領袖人物都是這樣。但民族主義是自然的而且是本能的；共產黨於革命勝利之後，胸子裏仍舊會長出民族主義來。鮑爾希維黨在波蘭戰爭中很受民族思想的擁護，該黨的地位因此也增加了不少呢。

我只在莫斯科戲院裏見過脫洛斯基一次。那時英國工黨代表坐着從前俄皇御用的包廂。脫洛斯基在廳前和我們談了幾句話，隨後走到包廂前面，疊臂而立，全場大聲歡呼。脫洛斯基就用簡括的軍用辭句演說了幾句，聲音又短又尖銳，末後更請大眾「爲在前敵健兒三呼萬歲」。於是聽衆應聲雷鳴，那呼聲好像一九一四年秋天倫敦羣衆的呼聲一般。脫洛斯基和紅軍現在顯然有民族思想隱在他們的後面。亞洲俄羅斯的光復，不免使帝國主義的思想復活，雖然他們中有許多人——據我偵察出來的——絕對不承認有這等事。共產黨握權既久，不免改變他的理論；而且一個人掌握政權之後，要他保留那流落逃亡時的人生觀，實在

是很難的。要是鮑爾希維黨繼續掌握政權，共產主義就不免要消失，而且他們漸漸要變得和亞洲別的政府一般——舉一個例，就像在印度的我國政府——這是可以斷定的。

三 共產主義與蘇維埃憲法

我往俄國前，就預想好去把俄國新式代議政治考驗一下了。凡是關心鮑爾希維主義的人，都知道俄國的選舉法，下自鄉會起，上至選出人民委員（其地位與總長相當）的全俄蘇維埃止。我們聽得人家說，這種制度因有回招權，職業選舉制等等的規定，對於民意的確定和記錄比舊制度完備得多了；從這一點看來到底蘇維埃制度能否出於議會制度之上呢？這也是我所希望研究的一個問題了。可惜我們竟無從研究，因為蘇維埃制度已經快要消滅了。無論在都市，在鄉村，要是採用自由選舉制度，共產黨決不會得大多數。因此政府不得不採種種方法，

以謀政府黨候選員的選舉勝利選舉大概用舉手表決法所以反對政府的人便不免爲政府黨注目這是第一種方法無論那個候選員要不是屬於共產黨便不許從事印刷印刷工廠一概在政府手中這是第二種方法非共產黨候選員不能開會演說因爲一切會場都是國有的這是第三種方法報紙自然全是官報了私辦的日報是禁止發行的但是反對黨選舉雖有許多困難門希維黨却還能在莫斯科蘇維埃一千五百議席中占有四十議席這四十議席都是用口頭選舉法的幾家大工廠中指名派出的。

莫斯科蘇維埃在名義上雖是莫斯科的統治政府實際上却不過是個選舉人的團體從這個團體中選出四十個執行委員又從執行委員當中選出九個主幹(Prezidium)這九個主幹每日會議掌有一切的權力至於莫斯科蘇維埃祇一星期開會一次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却沒有開會反之主幹却是每日會議的政府對於執行委員和主幹的選舉自然容易施壓力的而且更須知道人民對於政

府的抵抗全然不行因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全是絕對禁止的這種辦法結果便使莫斯科蘇維埃裏的主幹，全是純粹的共產黨罷了。

莫斯科蘇維埃議長喀美納夫 (Kamenov) 向我們說，人民回招的事情是常有的，即如莫斯科蘇維埃裏的議員被人民回招的，每月平均有三十次。我問他回招大概根據什麼理由，他說出四種：（一）飲酒（按俄國酒已禁絕）（二）因赴前敵不能執行職務；（三）對於選舉人方面變換政見；（四）不能向選舉人按期報告，因為蘇維埃議員是規定每兩星期須向選舉人做報告一次的。我從在俄國親見的情形推想起來，可以斷定議員被人民回招大都是由於第四種理由。回招可使政府獲得壓迫的機會，這是顯然的，不過俄政府到底是不是借回招制度來做壓迫民意的工具，我却不曾詳細考察呢。

在鄉村區域所施行的選舉方法，可又不同了。鄉蘇維埃中不見得有共產黨議員；就我所見過的幾個鄉村而論，沒有共產黨，幾乎是通例。但我在鄉村上問他們

怎樣的舉代表到伏洛斯德 (Volost) 和古貝尼 (Gubernia) 裏去。（伏洛斯德是較大的區域，約等於縣，古貝尼更大，約等於府）我才知道他們簡直沒有派代表去。這句話我不能徵實，或者言過其實，也未可知，不過據他們說，他們要是選出一個非共產黨的代表，便不能得到鐵路旅行的護照，所以便不能列席於伏洛斯德或古貝尼的蘇維埃了。我在薩拉多夫地方親見古貝尼蘇維埃開會，其中規定的議席，都市勞動者的代表遠在農民代表之上，而且在極大農業區域的中心地，農民代表出席的人數也很少，這是很詫異的事。

全俄蘇維埃按照憲法乃是最高機關，人民委員須向他負責的，但會議次數也很少，而且漸漸的越變得有名無實了。就我個人所見，全俄蘇維埃的唯一職務，祇有批准憲法規定的各種決議案。這種決議案（關於外交政策的更多）都由共產黨預先決定，蘇維埃開會時並不討論，隨便批准罷了。

一切的實權都操於共產黨之手。現在全國約一萬二千萬人口中，共產黨共有

六十萬人。我從沒偶然遇見過一個共產黨。我在街頭和鄉間遇見的人民，我問他們時，總是說沒有黨派的。只有某次我問幾個農夫，他們却公然說是皇黨。但農民不喜歡鮑爾希維黨的理由，却也不好算是正確的。人家說俄國農民的生活比從前好得多了，照我自己所見，也可以斷定這是實話。我在鄉間所見的男女老幼，沒一個面有飢色的。大地主現在都沒有了，農民倒着實賺錢。但是都市和軍隊都需要食糧，政府不能不向農民去取，除却紙幣又沒有兌換食糧的東西，而紙幣又是農民所排斥的。現在俄皇所發的盧布紙幣比蘇維埃所發的盧布紙幣要多值十倍，而且俄皇所發的紙幣現在流行還是很廣。這種紙幣雖是不合法的，但在市場中，人民仍可從皮夾裏取出來，公然的行用。我並不敢斷定農民是一定希望復辟，他們不過守着習慣而且不喜新罷了。他們不會聽見過封鎖，有許多農民簡直不知道俄國正在和波蘭打仗，因此他們也不會知道政府為什麼不能把他們所需要的衣服農具供給他們了。他們既得了大地，又除他們鄰近的事情以外餘事一

概不知所以祇想把自己的鄉村獨立，不論那個政府要是向他們有所要求，他們都是要反對的。

共產黨因受外界壓迫，雖不至於分裂，但是內面却也分爲數派，這在實際政治底下往往如此的。我看政界人物大概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經過多年逋罰的老革命黨，都佔有最高的地位。監獄和流亡的生活使他們化爲固執化爲狂熱，而且和國情不大親切。他們都是正直的志士，都堅持着一種信仰，以爲共產主義一定可以整頓宇宙。他們自己以爲決不至於感情用事，但在實際上他們對於共產主義，對於所創造的新制度，全是出於感情的；他們所創造的並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爲農民所反對，農民只要有土地旁的都不要；這種情形他們都沒法子去對付。他們對於官員中有腐敗酗酒等情事，都毫不矜憐的加以懲罰，但在一方面呢，他們却造成一種極容易誘致腐敗的制度；而且他們自己那種理論，也可以使他們相信，在這種制度下，腐敗分子是極容易滋長的。

第二類——凡在政治上居次高位的多屬於這一類——是一般少年新進

他們是因見了鮑爾希維黨的物質成功纔加入鮑爾希維黨的新政府許多被人嫌惡的事情都是他們弄出來的。說起來如警察，間諜，密探等等都是，大多是從帝政時代用下來的；這些人所以能够得到好處，就是人民不違法便不得活的緣故。這種情形可把特別委員團來做例證。特別委員團實際上是獨立機關不受政府節制的，自己有一聯隊的兵，那兵食糧比紅軍更好。這個機關可以借着投機或圖謀反革命這兩個罪名，不加審問任意拘禁男女人民。被特別委員團不加審問即行槍斃的共有數千人；現在這機關雖在名義上已沒有處置死刑的權力，但在實際上却不一定是由樣的。該機關到處派有間諜，平常小民因此生命很危險的。

第三類所包含的却不是熱心的共產黨，他們因為政府勢力鞏固所以和政府結託的。他們的目的却不在於權利，有的是為愛國心所鼓動，有的呢，因為因襲制度的障礙打破以後有自由發展他們的理想機會所以加入的。在這一類中頗

有許多實業界成功的人才，才幹和在美國所見的許多托拉斯大王相同，不過一個目的在於成功和權力，一個只在於金錢罷了。把這一類有才幹的人都搜羅了，替公衆服務，不許他們像在資本社會那樣的攫奪財富，這一種處置，鮑爾希維黨的確是成功的。除軍事勝利以外，或者這要算鮑爾希維黨最大的成功了。要是俄國議和成功之後，俄國工業一定有可驚的進步，或者俄國竟成爲美國的勁敵，這也許是可能的。鮑爾希維黨從他們的手段看來，全然是個實業家；除掉資本家的過度報酬之外，近世工業上的一切方法，他們都喜歡採用的。而且用嚴酷的紀律管理勞動者，這樣辦下去，可使勞動者養成勤懇高尚的習慣，這種習慣俄國人向來很爲缺乏，而且俄國向來所以不能成爲大工業國之一，也只因爲有這種缺點罷了。

四 李寧脫洛斯基和高爾基

我到了莫斯科之後，就和李寧用英語談了一個鐘頭。李寧的英語很不錯，所以雖有一個翻譯在旁，却用不着他。李寧的房間裝飾很簡樸：只有一張大案桌，壁上掛了些地圖，兩口書架，一把請客坐的安樂椅，此外便是兩三把硬椅罷了。他不愛繁華，也不愛安適，這是顯而易見的。他很和氣而且很恬淡，全沒傲慢的樣子。要是有人遇見他，不知道他是誰，再也不會想到他是一個握大權的人，而且再也不會想到他是個著名人物的。這種不擺架子的人物，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迫近身子瞧看來客，一隻眼睛閉着，彷彿能夠增進別一隻的視力似的。他笑得很多，初笑好像是表示和好和歡悅，後來漸漸知道笑中是略有惡意的。他是很專斷，很沉靜，毫不畏憚，毫不爲己；他實在可以代表理論的實體。覺得唯物史觀便是他的命根。他好像一個大學教授，在一方面希望人家對於他的學說，能够了解，在一方面因爲人家誤解他的學說或反對他的學說，又非常憤恨。大學教授極喜歡向別人講解學理，李寧却也是這樣的。我覺得他對於大多數人都看不上眼，他簡直是一個文

化的貴族。

我對李寧的第一問，便是：他承認英國的經濟政治情形有若干特點？鼓動武力革命到底是加入第三國際的必要條件，這是我所亟欲知道的；雖然因為別人已正式問過，我沒有直接問他。他的回答不能使我滿意。他說英國革命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因為勞動者對於議會制度還不至於發生反感。但他希望只要有了工黨內閣便可以達到這種結果。他想假如叫韓徒生（工黨領袖）去做首相，那麼他一定幹不成事，於是那班組合勞動者便會轉到革命的路上去了。根據這種理由，所以他希望英國的同志竭盡能力，使工黨得佔議會的多數；他不主張脫離議會競爭，却主張加入議會，因為工黨在議會得勢之後，議會制度的壞處，便容易看出來了。我國多數人覺得在我國用武力革命既不必能而且也必不可的理由，在他以為毫不足重，以為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私見。當我提出英國如何可以不流血而成功的話，他把這話完全撇去，以為這不過是一種妄想罷了。他關於英國的

智識和心理想像，我領會得很少。馬克斯主義的全體委實是和心理想像相反，因為他是把政治上什麼事情都歸之於物質的原因的。

我繼續問他在這麼一個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內，共產制度可以穩固而且充分的建立起來嗎？他承認這是很難；他說到農民不得不用食物來掉紙幣的時候，便笑了一笑；俄國紙幣之失信用，在他似乎以為很有趣的。但是他說——這的確是實話——只要有貨物可以供給農民，便什麼都好辦了。爲了這一層，他很注意工業的電氣化，他說這是在俄國工藝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但非經過十年不會成功。他很起勁的——他們講話都是這樣的——講到用礦煤發動電力的大計畫。他自然以解除封鎖爲唯一的救急法；但是除非別國都起革命，這是不會徹底而且持久的成功的。他說鮑爾希維政府和資本主義國的和議永遠不會牢穩的；協約國困倦了或者內部分裂了，也許和俄國議和，但他相信平和的期間一定很短。我從他和多數的共產黨領袖當中看出，他們對於議和和解除封鎖兩事，似乎不

像我們那樣的熱切。李寧深信除掉世界革命和廢除資本制度以外，弄不出好事情來；我覺得他對於和資本主義國恢復通商關係這件事，不過當作一種敷衍手段，沒有什麼價值的。

他說到農民分爲貧富兩種，政府竭力攬掇貧農去和富農作對，結果便釀成暴亂的行動，這種行動他覺得很有趣似的。他的語意似乎以爲用專斷對付農民的辦法，還得繼續多時，因爲農民現在還喜歡自由貿易咧。他說，他從統計（這種統計我信以爲可靠的）上看來，這兩年中農民食物要比從前充裕得多了；他接着正正經經的說：『可是這些農民還是要反對我們。』我隨後問他有許多人說他在俄國只造成一種『農民所有權制』(Peasant proprietorship) 並不是共產制，對於這種批評，用什麼來答辯呢？他答說這不是實情；可是實情是怎樣，他却沒有說出來。

我最後問他：要是和資本主義國恢復通商之後，也許造成資本勢力的集中，共

產制度的保存不免又加一層困難，這種事情一定不會有的嗎？我覺得有許多熱心的共產黨也許有一種恐慌，以爲對外通商之後，不免要把別種「邪道」引了進來，那時把現制硬做下去，便要不行了。我願意知道李寧有沒有想到這一層。他承認通商也許發生困難，但他說這種困難，比之於戰爭所生的困難，總要小些。他說，兩年以前他和他的同黨都想不到他們能够和全世界相敵一直到如今的。他們所以能够存立，他歸功於各資本主義國的互相猜忌互相離異，而且也歸功於鮑爾希維黨宣傳的能力。他說，當時鮑爾希維黨提議用傳單去抵敵槍礮，德國人聽了幾乎笑死，可是後來才證明傳單的力量確是不小呵。我看來他並不承認英國工黨社會黨干預過這件事。對俄大戰不能發生，多半是英國工黨的功勞，因爲工黨抱反對的態度，所以英國政府不得不出於隱祕的行動，而且半吞半吐的否認對俄戰爭的事情；這一層他好像沒有知道。

他對於北峯貴族（Lord Northcliffe 泰晤士報、每日郵報等的主人）的施

攻擊，着實感激。他說要送一個勳章給他，因為他很有宣傳鮑爾希維主義的功勞。他以為這種謾罵，在一方面使資產階級聽了害怕，至於勞動者方面呢，所得的却是反面的結果。

我想我要是不知道他是李寧，遇見的時候，決不會當他大人物的；我覺得他太固執太褊狹了。據我猜想起來，他具有這般能力，是從誠實，勇敢，堅定的信仰——就是對於馬克斯福音的信仰，這種福音很可以替代基督教殉道者對於極樂園的希望，不過利己觀念比較少一點罷了——這幾種好處得來的。他對於自由無所顧惜，也和飽受了笛阿克列辛（Diocletian）殘虐之後一旦得勢，便圖報復的基督教徒一般；大概相信有一種萬應良方可以醫全人類疾病的人和愛好自由總是不相容的。如果這話不錯，那麼我對於西歐各國人的懷疑態度，不能不深為慶幸了。我往俄國去的時候，自信以為是一個共產黨；但一和那些絕不懷疑的共產黨接觸之後，却因此使我生了無限疑慮了，不單對於共產主義懷疑而已，凡堅

信一種主義，甚至造成絕大苦痛而亦不恤的，我對這種主義也都懷疑。

脫洛斯基這個人——共產黨並不拿他和李寧同視的——從智慧上和個性上——雖不是從性情上——看來，使我受許多的印象。不過我同他見面時候很少，所以也只是皮相的觀察罷了。他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珠，軍人的姿態，閃電一般的智慧，有攝引力的個性。他委實是很漂亮，生着一頭很美秀的捲髮；要是女人遇見他沒一個不軟化的。我覺得要是沒有別的事情絆住他，他倒是極風流蘊藉的。我想——也許我說得不對——他愛浮華要比愛自由來得更多，——那種浮華就是人和美術家或戲子交際時所嘗有的。見了他的人不能不和拿破崙比較了。但我這裏決不是估量他信仰共產主義的力量，這種信仰也許他是極誠篤極深厚的。

這兩個人和高爾基相比，便大大不同了。我在彼得格拉的時候，見過高爾基一次，但為時不多。他睡在牀上，光景像是要死，顯見得是傷心已極了。他求懇我要是

說起俄國的時候，不要忘了俄國的苦痛。他擁護現政府——我要是個俄國人，也是這樣——不是因為現政府全無罪過，不過換了第二個，恐怕更加不如了。人見了他便覺得俄國人都有一種的『愛』，使他們甘為忍無可忍的犧牲，而不肯狂信純正馬克斯派的學說，也就是由於這個『愛』了。我覺得在我見過的俄國人當中，惟他最可愛，惟他最能够得我的同情。我還想多問幾句，可是他說話很艱難，而且不斷的咳嗽，咳嗽起來很有些可怕，所以我不能停留了。我所遇見的智識階級中人——這一階級的人受苦最甚——都向我表明感激高爾基為他們盡力。唯物史觀委實是不錯，不過對於文明的較高出產物，也應該關心些，那才對呵。時常有人說起鮑爾希維黨對於藝術上頭頗有多大的設施，但就我所見，除保存幾種舊存的藝術品外，我找不到旁的設施。這一層我曾向他們黨人裏頭問過，這個黨人有些不耐煩起來，回答道：『我們還沒有工夫去創造新藝術；便是有工夫，創造新宗教要緊得多呢。』在這種空氣內，藝術不能繁榮，那是不免的，因為藝術是『無

強權的」(Anarchic) 是和組織相反的對於保存俄國文化，保存俄國的藝術生活，凡是一個人所能做的，高爾基都已做了。可惜他快要死了，也許俄國的文化也快要死了罷。

(註)譯者案這一段文字，羅素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倫敦國民週刊上有所謂正現犯訂正的原文一并譯出如下——

上星期我那篇文字最後的一句，無意中說出我所未有的思想，便是蘇維埃政府不注重或者反對藝術。其實不是這麼一會事，蘇維埃政府對於藝術，比我的政府還更要親切。我的意思是說在那種心的空氣之中，藝術是難於繁盛的，但我並不是說藝術家都受虐待。

五 國際形勢

在上面的幾篇中，我已經把鮑爾希維政府的缺點說過幾次了。但我們須要曉得，這大半是因為俄國的產業生活，除軍需品的工業外都已停止的緣故，也是因

爲俄政府拚命從事內戰外戰——連着國內敵黨不絕的恫嚇——的緣故。有了這幾種困難，所以暴虐、羅織、剝削自由這等結果，自然也不免了。我始終以爲要使俄國減少痛苦的罪惡，唯一的救濟法，只有議和與通商。議和與通商可以免掉農民的仇視，而且又可以使政府依靠着民意，不至於專用強力。處於這種情勢之下，政府的性質就會立刻變換了。現在積極推行的工業強制法也成爲不必要了。希望自由的一班人，便可以放膽發言，不至受幫助反動派幫助國仇的嫌疑了。食料的困難，更不成問題，因食料困難所必要的專制政治，自然也停止了。

反對鮑爾希維主義的人，大多以爲換一個政府，在俄國也容易存立的，這句話却有些相信不得。大凡近來到過俄國的人沒有一個不相信現政府是很穩固的。將來現政府內部發展，也許容易變成——但李寧是不會變的——拿破崙式的武力專制政體。但這是由內而發的變動——也許不是什麼大變動——至於經濟制度，大概不至於十分變動的。我從俄國人的性情和反對黨看來，不能不相信，

無論那種民主政治在俄國都不適用的。俄國所需要的，却是強有力的政府。鮑爾希維黨自命爲西方社會主義的先進，這一層實大有批評之餘地。依我的意見，他們的國際策略，實在是無可批評。但是從他們的政府看來，他們却是彼得大帝的繼承者，他們確已完成了必要的工作，雖然這種工作是不大爲人歡喜的。他們竭盡能力，用美國式的能率增進法，訓練那些游惰散漫的國民。他們預備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方法，發展本國的富源（關於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層下文更須詳述）。他們使軍隊中兵士都能識字；要是和議告成之後，他們對於各地教育事業，還有一番大振作呢。

但我們要是繼續拒絕議和與通商，我想鮑爾希維黨也不至於推翻的。俄國在這幾年內還是要忍受艱難，和從前一般。但是俄國人能够安於辛苦艱難，這是西歐民族所不及的；在我們所萬不能堪的境遇當中，他們却能够照舊的生活工作。俄政府受人逼迫，現已逐漸從自衛政策變到帝國主義的政策了。協約挑唆波蘭

和俄國拚命戰爭，又強迫德國解除武裝，這種辦法，無非使德國變成俄國軍器和傳單的侵入地罷了。亞洲的全部正在引動鮑爾希維黨的野心。前俄羅斯帝國的亞洲屬地，現在差不多都已入他們手中了。到土耳其斯坦去的火車，已在照尋常速度行駛，我親眼看見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裝載到窩瓦河汽船上去。波斯和土耳其到處因有鮑爾希維黨的輔助，已發生猛烈的叛變。印度和紅軍接觸，也不過是幾年以內的問題。要是我們仍舊和鮑爾希維黨反對，那麼十年之內他們必能完全吞亞洲，任憑那一國的現存軍隊，都敵不過他們的。

俄政府精神上本來毫沒有帝國主義的，他們所願意的是和平不是戰勝。俄國是已經厭倦戰爭缺乏物品的了。但要是西歐諸國堅持着繼續戰爭，也許另有一種精神繼之而起，這種精神現在已有些顯出來了。不是征服便是被征服，在這二個之中，他們自然只有揀一個。征服亞洲不是什麼難事，但我們這方面，從帝國主義的見地看來，却真是糟糕透了。那時歐洲大陸呢，必不出於革命、內亂、經濟大變。

動這幾種情勢，用武力摧殘鮑爾希維主義，這一種政策本來是愚拙的，背理的，現在却又變爲不可能，而且滿裝着禍祟了。我們的政府好像已有些覺悟這種危險了；我們希望政府能够充分覺悟，使不至爲反對黨所愚才好。要是不然，我們這次所謂大戰爭（指歐戰）恐怕不過是下次全世界大戰爭的一個引子。和這種大戰爭比起來，前次大戰怕不過是些陣前的小衝突罷呢。

信仰鮑爾希維主義的和西歐方面贊助鮑爾希維黨的人，對於這種未來的大戰，是早已胸有成竹決不會慌張的，因爲他們相信大戰的結果，共產主義一定可以建立起來，現在全世界所受的罪惡，一定可以完全治好。這種自慰的信條我却不能相信。我雖也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但我所信仰的却不是把無限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那種共產主義。我的意見以爲權力的正當分配，和物質的正當分配，實在是一樣的重要。可以把大權永久信託的人實在很少很少，事實上久已證明的了。要是俄國和議成功，那麼被戰爭禁壓的那種自由思想，平民政治的思想，

都可以復活，而且工人的產業管理權——在鮑爾希維主義初期本來是有的一——也可以恢復了。要是不然，戰爭繼續下去，專斷政治自然也繼續下去；那麼遲早總有一日，統治者會得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去尋求經濟特權的，這種現象現在已有了幾分朕兆；像那班高級的共產黨員生活比平常人民要安適得多，那便是一個例了。不過他們這一種情形，却也毫不足怪，因為政府中人為求健康及增進辦事能率起見，却也非安適不可，俄國政府的辦事時間和所受壓迫，比起西歐政府中人自然也繁重得多呢。

話雖如此說，到底此風是不可長的。雖然現在俄國處高級地位的人大多數是極熱心的共產黨，他們從前也曾表示過情願為主義犧牲一切的決心。但是他們總有一日要把政權讓給那些信仰不堅的——機會主義的——人的；這種人和實際政治家一般，當然是以實利的見地使用政權的。這種人要是一有調遣軍隊的能力，就不難下一命令，使執政階級享有鉅額的俸銀，得到特別的權利。他們一

一旦得勢，腐敗和掠奪未開化國家的機會也許一步一步的增多起來。我不敢信這種誘惑是永遠可以遏止得住的。

鮑爾希維黨有一種完密的理論，包含在第三國際之內，依照這種理論，世界各處應該倣照俄國，用少數專斷方法把共產制度建立起來。這種理論的根據便是：因為現在一切宣傳的武器——尤以學校和報紙爲最——都在資本階級的手中，所以要使大多數國民相信共產主義，實在是不可能。這種論斷是很有理由的，的確是能够表明用平和方法造成共產國家的極端困難的。這原是不錯，但用了這種論斷，證明共產主義——穩固的或是要得的那種共產主義——只有少數專斷才可以辦到，這却是錯了，講到政治理論，必須研究所謂心理的動力，就是說人的宗旨和信仰，是和外面的情勢共同變化的。人要是掌握大權變成慣常了，便覺得權力非常可愛，決不願意輕易放棄，差不多人人是如此的。如果他們本來是大公無私的人，他們一定自己解釋，以爲公衆利益起見非他們握權不可的；

論他們是否自欺，他們總是要把權柄牢牢握住，非遭武力推翻，決不肯放手的。所以爲實行共產主義起見，少數的武力的專斷，原不過一時之計，但弄到後來，總要發生上述的結局，和現在俄國一般。從少數據有廣地大軍的有才幹的人的心理看來，差不多可以斷定，他們壟斷大權不肯分人，所持理由，一定比將權力分給別人的理由更爲充足的。而且具有最大權力的人，要是自己要錢時，也可弄到最大的財富。他們遲早總是要變爲要錢的，這麼一來，共產主義的好處，便完全消失了。

爲了這幾層理由，又爲了平和主義的理由，我不贊成鮑爾希維黨的哲學，而且也不相信廢棄緩和的民治方法，採用煽動民衆的主張。

俄國是後進國，還不配採用平等協作的方法，這種方法，是西歐諸國所用以代替政治上產業上的專斷權的。在俄國呢，或者免不了要用鮑爾希維黨的那種方法；無論如何，我却不打算下大體的批評。但是，這種方法對於先進國確是不適用的；要是我國社會黨震於鮑爾希維黨的威權，依樣畫葫蘆，那便不免於退步了。要

是我國守舊黨不學無術逼迫着社會黨人使不得不採暴力革命的方法那更是不可饒恕了。我們所有的是文明的遺產，和相互容忍的精神，這種東西，對於我們，對於全世界，都是極重要的。俄國的生活向來比我們的生活，殘忍暴戾得多，但戰爭的結果，這種殘忍暴戾不免要變成全世界的現象了。我盼望英國的新舊兩派大家溫和些，不要變到這樣才好。講到最後，我們對於鮑爾希維黨的觀察，不可再為感情論調所蒙蔽，這是最要緊的；鮑爾希維黨不是可崇拜的神仙，也不是該剷除的魔鬼，他們不過是有膽量有才幹的人竭盡才力，從事於目前不可能的事業罷了。

六 都市與鄉村

使農民拿出食料供給都市，這是俄國和中歐各國所共有的問題；據人家說，俄國對付這問題，似乎比別國辦得妥貼些。在蘇維埃政府這問題最關重要的，在於

莫斯科彼得格拉這兩處，除這兩處之外，別的都會都不十分大，而且大多是在農業區域的中心。在俄國北方，便是鄉民，食料也要靠南方的供給，這話是真的，不過北方居民比較起來，究竟是少數。尋常都說，莫斯科彼得格拉兩處的食物問題，其實只是運輸困難的問題，據我看來，這話却不是完全正確的。俄國車輛固然是非常缺乏，修理完好的火車頭尤其希少。但是莫斯科的周圍，都是極肥沃的土地。我在莫斯科鄉間坐汽車游行了一日，雖然游行的目的是參觀兒童健身所，不是參觀田莊，但我在游行中所見的母牛，那牛乳已足夠供給莫斯科全城兒童的需要了。不論那一種食物，只要出重價錢，在市場上都買得到。我游歷過俄國好幾處的鐵路，所見的良好貨車倒也不少。從這幾種情形看來，可見得說食物困難是由於運輸困難，實在太言過其實了。彼得格拉食物匱乏是由於運輸不便的緣故，自然還說得過去，莫斯科就不能了，因為彼得格拉的食物，都是從莫斯科南部運來的。在彼得格拉有許多居民，面色像有不大喫飽的樣子，在莫斯科就少見了；但不大

喫飽——雖然不好算是餓——是全國普遍的現象，這也是無疑的呵。

政府對於都市勞動者按名發給定額的口糧，只收法定的極低代價。表面上雖說政府握有食料專賣權，而且定額的口糧一定足夠維持個人的生活；實際上可是不然，定額的口糧決不足以維持生活，而且官發的定額口糧只不過是莫斯科食糧供給的一部分。而且有許多人告訴我——我不知道是真的不是——食糧的分發是沒有定規的；有幾個說大約是每兩天發一次的。因為有這種情形，所以不論富的貧的，差不多都到市場上去買食物的。市場上物價比政府的法定價值大約要貴上五十倍；買一磅牛肉大約要一個月的工資。人民要想得到額外的食物，便想出各種的法子。有幾個除法定勞動時間以外，做額外的工作，賺額外的工資。因為法律上雖然規定八小時勞動制，但一個人做八小時工作所得的工資實在不够生活，所以餘多的時間，要叫他不再做別種的工作，是萬萬做不到的。但普通却另有一種謀得額外食物的方法，就叫做『投機』，那就是買進又賣出。有幾個

從前殷富的人，把衣服，傢私，珠寶等等賣去，兌換食物，便有人把這種東西買來，再加上價錢賣了出去；這樣經過二十多人的手，纔最後賣給殷實的農民或暴發的投機商。有許多人呢，有親戚住在鄉間，便不時到鄉間走走，去一趟，便帶了幾袋麵粉回來。私人攜帶食物至莫斯科是有干法紀的，火車上也是要搜檢的，但只要用了賄賂或藏匿，便不會搜出。市場上買賣食物也是犯法的，警察時常要來搜查，但照慣例却只要躲過一刻就算了事。因為私人買賣是犯禁的，結果便弄得買進賣出從中取利的人分外衆多，這種投機營業，實在比資本主義國興盛得多呢。要是把做這種買賣的工夫省下來，很可以幹許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因為私行買賣是犯法的，所以實際上使全莫斯科人民都受着警察的威脅。還有一層，現在的貨物供給多半是仗着從前富戶有許多的存積，存積用完了之後，除非工業同時完全恢復，那種制度便不免根本倒壞了。

現在的情形不滿人意，這是顯然的，但替政府想想，却也有許多的難處。都會中

從事工業的人民，所做大半是政府的工作，和供給軍需於軍隊等。這種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其費用自然只有取諸賦稅。要是政府向農民收一宗適中的賦稅，那莫斯科彼得格拉兩處的食物便容易想法了。但是農民對於戰事對於政府却毫不關心。俄國面積太大了，一處受人侵擊，在別處却毫無接觸；而且農民的智識太愚昧了，像英國法國德國那樣的民族自覺却全然沒有。農民不願意把出產的一部分作國防之用，只肯拿出一部分作掉換所需貨物——衣服，農具等——之用；但這種貨物，因為戰爭和封鎖的緣故，政府又實在辦不到呵。

當食物缺乏達到極點的時候，政府便向農民強迫徵調。派了紅軍用嚴峻的方法實行收取。這種方法現在雖已不用了，但農民拿食物分給政府，還是不願意，這是當然的事情，因為政府的紙幣一文不值，而且私人收買者所定價目比政府高得多呢。

食物問題是人民反對鮑爾希維黨的主要原因，但是我却也想不出什麼方法，

可以得人民的歡心。鮑爾希維黨受農民的憎怨，是因他們取去的食物太多；鮑爾希維黨受都市居民的憎怨，是因他們取來的食物太少。農民所要的就是所謂自由貿易，——就是農產物不受政府的支配。要是這種政策果被採用，都市人民便要完全餓死，不單是餓餓艱苦罷了。有人說，俄國農民對於協約國已漸有敵意，這全然是誤解。*每日新聞* (Daily News) 七月十三日有一篇論文裏說：『俄國農民——這不是共產黨也不是鮑爾希維黨——對於協約國全體，已漸生怨恨，對於我國，更恨得厲害。』俄國真正的農民從沒聽到過協約國或是我國；他不懂得什麼叫封鎖；他所知道的只有他本來有六頭牛，現在政府取了一頭去，給了窮困的農人了；除掉他和他家屬所需之外，所有的穀都給政府照極低的價格收買去了。至於政府這種行動根據何種理由，他却全不關心，因為他的眼光只限於一村之內罷了。俄國的一個鄉村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政府只要得到了食物和所需的兵，對於這種舊式鄉村共產制度，便悉聽自然，不加干涉的；這種鄉村共產

制度呢，却又和鮑爾希維主義截然不同，所根據的只不過一種初民社會的文化罷了。

俄政府所代表的乃是都會工業居民的利益，但他的營盤却又繫在農民國的中間；政府和農民之關係，與其說是和尋常政府一般，倒不如說是專管外交軍事的政府。俄國的經濟情形，和中歐一般，乃是利於鄉村而不利於都市的。要是俄國採用民主政治，採用服從多數意志的政治，莫斯科彼得格拉的居民怕都要餓死了。莫斯科彼得格拉的居民全靠借着軍政民政的全部權力才可以活命。俄羅斯這一個強大的帝國，現在看去很是希奇，四圍（指鄉村）是極饒富的中心（指都市）却窮乏得要命。生產力最小的人却握着最大的權力；所以他們只有濫用權力，才可以活命。現在俄國情勢，講到底全是兩種事實造出的：（一）人民的工業生產能力幾乎完全納於戰爭之一途；（二）農民並沒知道戰爭的緊急，也不知道有封鎖的事情。

俄國陷於這種不好而且困難的地位實在也是迫不得已，借此來責備鮑爾希維黨，那便錯了。俄國的問題，只有兩條法子可以解決：（一）停止戰爭和封鎖，這麼一來，政府就好從國外購入商貨，和農民交換所需的食品；（二）逐漸發展俄國的工業使可以獨立。第二條法子自然太緩不濟急，而且有許多的困難，但俄政府中才有幹的人，却都相信要是和議不成，那一定辦得到這樣的。要是我們拒絕議和，拒絕通商，使俄國不得不不出於第二法，我們便不免失却和俄國聯絡友誼的唯一媒介了；便不免使蘇維埃政府厲行宣傳世界革命的政策，一無留難一無抵擋了。

Bertrand Russell's Essay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回 (東方文庫) 羅素論文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必究
翻印
著作權
此書有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模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貴陽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張家口新嘉坡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模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封底